

社会维度的社区健康影响机制研究*

——以广州典型社区为例

Research on Community Health and Its Influence Mechanism: A Case Study of Communities in Guangzhou

叶原源 刘玉亭 YE Yuanyuan, LIU Yuting

摘要 健康中国战略导向下,社区作为深耕人居健康的基层单元备受关注。已有研究多集中在物质、社会因素对居民身心健康的影响,在健康人居的主体内涵、要素选择、分析框架系统性等方面尚有不足。基于“人文”与“结构”的交叉理论分析视角,相应地聚焦于个体与社区两个层面,通过广州15个社区案例和3 302份问卷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系统分析和探究社区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社区健康的影响机制中“个体化”作用路径显著,印证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社区系统中的重要意义。同时存在显著的层级差异和多样化作用路径:物质空间属性、治理属性主要在个体层面对社区健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社会属性、经济属性则更多地体现了社区层面的“结构化”的作用路径。

Abstract Taking Healthy China as the strategic guidance, the community as the basic unit of human health has been concerned. Correlative studies mainly discuss the impact of material and social factors on resi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but the influence factors are still considered incompletely and the analysis framework needs to be more systematic.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levels, and uses the multi-layer linear model to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ommunity health, which is based on the "humanity" and "structure" perspectives, and the survey data of 3 302 questionnaires from 15 communities in Guangzhou.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levels i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ommunity health, as well as diversified action paths. On the whole, "individuation" has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path, which confirms the significance of human subjective initiative in the community system. The material space attributes and governance attributes mainly reflect the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community health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while the social attributes and economic attributes reflect more on the "structured" path at the "community" level.

关键词 社区健康;多维属性;多层线性模型;影响机制

Key words community health; multidimensional attributes;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influence mechanism

文章编号 1673-8985 (2023) 03-0008-07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 supr. 20230302

作者简介

叶原源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博士
刘玉亭(通信作者)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
教授,博士生导师, ytliu@scut.edu.cn

0 引言

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环境恶化、城市病、资源不公等问题涌现,严重威胁居民的心理健康,“人本”的发展转向愈发受到重视,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深化。人居健康作为广大民众的基本福祉,不仅是城市高品质发展的目标,更是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2016年10月我国出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把健康融入城乡规划、建设、治理的全过程,促进城市与人民健康协调发

展”。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强调坚持预防为主,倡导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2019年2月)中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塑造健康湾区”的发展目标。而后疫情时代,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升级,寻求多层面锻炼、呵护身心健康的路径,健康的人居环境也愈发成为社区认同感、幸福感的重要来源,是城市吸引力、竞争力的体现,酝酿着巨大的发展动能。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共建项目“社区治理视角下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模式与策略研究——以广州市为例”(编号GD22XGL0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当代城市社区的多维属性、邻里性及其影响机制研究——以广州市为例”(编号41771175);佛山市哲学社科项目“佛山推动人民生活更加美好的路径——基于儿童友好的社区健康环境营造研究”(编号2023-GJ165)资助。

在此背景下,相应的举措与实践取得一定成效,但也面临系列问题和挑战。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与存量转型、城市更新等过程中,物质、社会空间急剧重构,对各类居民主体的身心健康产生剧烈影响^[1-3]。一方面,健康资源与设施配置不均,各类居民主体的需求有待细化并践行更具针对性的优化措施,尤其是针对贫困群体及特殊的病患人群等的问题亟待解决。另一方面,现行政策与举措多着力于建成环境的优化,而容易忽略社会维度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有待进一步建构系统性的研究框架,解析多维度的影响及各维度的互效互力作用,推动多元的优化路径。此外,系统性的城市健康环境体系仍未建立,如何让健康人居有效地渗透城市—生活圈—社区等不同层级,取得更好的实效,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应对上述的问题与挑战,进一步系统建构、细化与深耕是发展的关键,而社区这一基层单元承载着人们广泛的日常行为,粘合着丰富而细腻的基层活力与需求,是细化、深耕人居健康的重要土壤,亦是建构多元层级健康人居体系的重要基础。“让健康就在日常中,让健康就在居民身边”,以基本的人居行为、感知及日常生活需求为起点,基于多维度属性建构系统的框架,从社区这一鲜活的基层尺度来开展健康人居研究,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

1 社区健康的相关综述与研究框架构建

1.1 社会维度的社区健康

1.1.1 人居环境与健康

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环境因素对城市居民健康的影响已经超过遗传因素^[4],且与之关联的个人生活方式与行为也成为影响人们健康的主因。健康的人居环境可界定为:以自然环境、建成环境、社会人文环境等多元要素构成的一个完整系统,具有完善的人居空间属性,能满足居民各种生活需求,并能有效提高生活质量、促进居民身心健康的环境系统^[5]。

目前,人居健康成为融合多元学科的研究热点,包括城乡规划学、健康地理学、社会学、环境科学、公共卫生、心理学等^[6-7]。人居健

康包括了生理、心理和社会健康3个维度的内涵,常用的测度量表包括GHQ-12心理健康量表、SF-36健康自评量表等^[8-10],其中社会健康与地方依恋、社区情感等紧密相关^[11]。随着“人本”的转向,中微观层面的内容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社区也成为人居健康研究的核心场域。而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建成环境及社会环境两大方面因素,鲜有对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存在影响要素的选取不够全面的问题。在建成环境方面,研究主要集中于社区的土地利用、交通网络、生态蓝绿空间、公共及便民服务设施等对身心健康、幸福感的影响^[12-13]。其中在西方的研究中,步行指数(walkability index)是描述建成环境总体特征的综合指标,公园绿地和食品商店成为核心的影响要素。在国内研究中,案例更多集中于北京、上海,由于健康测度标准、环境指标的差异,分析结果亦呈现多样化^[14-17]。此外,学者们对各关键因素的相关影响机理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18]2284, [19]},但在基于本土数据的研究框架体系、指标的建构上,仍较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在社会环境方面,研究主要集中于社区认同、邻里关系、社会网络、特定的邻里集聚环境、社区满意度等因素对居民健康的影响^[20-21]。近年来,不少研究发现建成环境的直接健康效应可能被高估。基于各种原因,一些物质空间环境的营建并未能显著提升居民的健康水平,而社区的集体社会运作,尤其是文化与规范、社区融合、社区支持系统等成为个体健康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22-23]。在地方感知和情感方面,相关研究表明,相较于物质环境感知,社区社会环境感知对居民自评健康的影响更加显著^{[24]33}。

1.1.2 社会维度的社区健康——内涵与测度建构

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的研究逐渐将健康人居的主体从个体拓展到社区整体,并强调社区健康并非只是个体健康的简单集合,而是作为整体具备各种健康效应。从宽泛的意义来讲,社区健康涵括了个体健康,自然与建成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经济环境、技术与治理环境等环境

健康,尤其强调个体与各环境的良性互动内涵,并贯穿在规划、建设和治理全过程^[25]。

本文主要关注社会维度的社区健康,即包括个体健康、社会环境健康、个体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3个层面的内涵。社会环境的内涵在中西方城市的发展与研究中不断丰富,196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贫富分化导致新贫困阶层的居住集聚,形成特定的社会环境,对居民就业机会、健康状况、生活态度、行为方式以及下一代教育水平等方面产生系列影响,引发学界的关注。在中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经济社会的剧烈重构,尤其是1990年代住房改革的推进,形成各种住房分异和邻里集聚,如商品房、保障房、城中村等住区。这些特定人群集聚产生的社会和环境效应引起学者的关注,由此也引发了更广泛的社会视角的居民健康研究^{[24]38}。

社会维度的社区健康研究更关注因集聚而形成的内在关联与影响,基于社区日常中的空间环境、信息传播、行为影响以及情感支持、活动参与等对健康水平的影响,从“人本”的特征,对人居健康进行更为立体的解析。具体特征主要包括:① 更关注不同阶层人群聚居所对应的环境资源特征,隐含了获取资源的能力与受限性等因素的健康影响;② 更强调集聚所带来的心理和行为的相互影响,包括信息与行为传播、行动范式、社会控制与安全、社区情感、文化与声誉等;③ 分享型的社区价值观、多元的社区参与、共同实现社区目标等均被视作促进社区健康的关键要素。相较客观物质环境,社会资本、社区凝聚力、社区网络等社会环境对居民健康具有更显著的影响,尤其是作用于心理健康方面。

基于社区健康的丰富内涵,本文总结已有的相关研究,提炼社会维度的社区健康的内涵元素,旨在结合认知、情感、行为等“人本”的特征,测度社区健康水平,并探析相关的影响机制。已有研究表明,社区归属感、安全感、社区凝聚力、社区满意度、地方依恋、社区文化特征等因素与居民健康息息相关,从多元角度诠释了健康的社会环境内涵^{[18]2273, [26-27]}。这些因素塑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形成与个体

健康的良性互动,综合体现了社区健康的内涵。由此,结合个体健康、社会环境健康,以及两者间的良性互动效应,本文归纳社会维度的社区健康的主要解释变量,梳理12个测度条目,具体包括:认同、归属、依恋、社群联结、信任感、安全感、自豪感、信心、共同价值观、共同行动、行为规范、行动影响,以此来刻画和度量社区健康的水平。

1.2 理论视角与研究框架

社区作为基于地缘关系的生活共同体,既是富于情感沉淀的栖息家园,又是现代城市语境下交叠了多元内涵与功能的综合单元。相关的研究与实践表明,在社区日常运行与组织中,主要体现了物质空间、社会、经济、治理4个维度的属性^{[28]1967, [29-30]}。基于现代社区的特征与属性,本文主要从人文主义、结构主义地理学中吸收相关的理论基础^[31-32]来建构系统性的分析框架,以社区的日常性和人本性为基本起点,关注社区多元的功能与多维度属性特征对社区健康的影响。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主要包括现象学、理想主义/存在主义,具有深厚的“主体性”内涵,为我们理解、探究诸多繁杂的地理现象与事物提供了“从人的角度”这一重要的思维认知。而结构主义则基于先验主义哲学,即将任意的事物或地理现象看作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组织秩序的整体结构,结构的本质具有内在动力、守恒性和某种封闭性。复杂的社会现象一般是由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难以用单一的理论解释,不少学者已运用多种理论方法、采用多种机制的探讨来展开分析研究^[33-34],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索加(Edward Soja)等学者都在尝试探究个体能动性 with 结构性动力之间的关系。

吸收“人文”与“结构”的相关理论思想,本文建构系统的研究框架:即社区的物质空间、社会、经济、治理四维度属性对社会维度的社区健康的影响,区别于已有的研究,从个体和社区两个层面的作用机制分析,回应“人文”与“结构”的理论内涵,既强调社区主观

能动性的内涵,又突显社区4个维度的结构性特征建构,以此探究各维度因子对社区健康的影响机制(见图1)。

2 多维属性视角下社区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

2.1 研究设计

2.1.1 样本选择与概况

以广州城市的基层社区为研究对象,社区样本的选择包含商品房社区、单位社区、老街坊社区、城中村社区和保障房社区5大类典型社区,综合考虑了区位、建设年代、人口结构特征、规模等因素,选择范围主要集中在广州主城区(见图2)。调研于2018年6月—2019年3月间进行,采取深入社区现场发放问卷并结合各类主体访谈的形式展开,15个社区共回收3 302份有效问卷。15个样本社区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问卷调查对象的年龄



图1 社会维度的社区健康机制研究框架示意图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diagram for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ommunity health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结构以18—60岁为主,占比70.6%;已婚人士占82.40%,在业人士占比62.29%;受教育程度以高中及以上为主,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为26.23%。对比广州市“六普”数据,样本的总体结构比例在合理的解释范围内,具备代表性。

2.1.2 模型设计与基本变量关系

近年来,多层线性模型较广泛地应用于不同尺度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分析个体、社区和城市层面的影响差异。从数据结构来看,社区健康的影响机制包含居民个体和社区层面的嵌套关系,也就是说,有些影响可能主要来自居民个体,而有些则可能来自不同的社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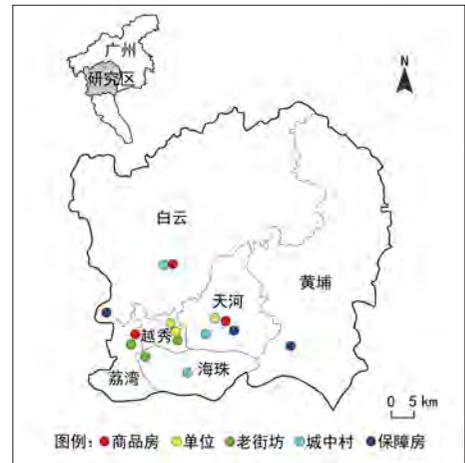


图2 样本社区的区位分布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location distribution of sample commun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1 15个案例社区概况

Tab.1 Community profiles of the 15 samples

社区名称	类型	区属	建成年代	面积/km ²	常住人口/人	流动人口/人	问卷数/份
汇景社区	商品房	天河	2000s—2010s	0.648	20 700	1 300	241
时代玫瑰社区	商品房	白云	2000s—2010s	0.118	11 716	1 500	226
富力东社区	商品房	荔湾	1990s—2000s	0.120	4 695	253	238
科苑社区	单位房	越秀	1970s—1980s	0.102	9 614	1 740	228
邮通社区	单位房	天河	1970s—1980s	0.250	8 000	1 500	216
华工社区	单位房	天河	1950s—1980s	1.480	22 393	1 500	223
逢庆社区	老街坊	荔湾	1900s—1930s	0.077	5 090	992	158
新河浦社区	老街坊	越秀	1900s—1950s	0.609	4 577	885	148
龙导社区	老街坊	海珠	1900s—1930s	0.082	5 651	3 033	173
绿荷社区	城中村	天河	1990s—2000s	0.076	5 251	8 008	212
上涌中约社区	城中村	海珠	1990s—2000s	0.046	3 235	10 000	272
黄边社区	城中村	白云	1990s—2000s	0.642	12 000	20 000	279
棠德北社区	保障房	天河	1990s—2000s	0.170	10 977	321	219
瑞东社区	保障房	黄埔	2000s—2010s	0.045	7 498	542	231
金沙新社区	保障房	白云	2000s—2010s	0.130	7 652	348	238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调研信息整理。

本身,社区之间的差距即组效应或背景效应不能忽略。为此,研究建立多层模型来探究社区4个维度属性及相关变量在个体层面和社区层面对社区健康的影响^{[28]1969},即以社会维度的社区健康为因变量,以基于主观评价的社区4个维度属性及相关因素为自变量,来建构多层线性模型,以辨析各维度属性及相关变量对社区健康的影响,剖析来自居民个体的或来自不同的社区本身两个层面的路径差异,探讨相关的影响路径与效应等(见图3,公式1-公式2)。

多层线性模型——(个人/社区层)社区四维度属性对社区健康的影响公式如下:

个体层级:

$$N_{ij} = \beta_{0j} + \beta_{1j}P_{ij} + \beta_{2j}S_{ij} + \beta_{3j}E_{ij} + \beta_{4j}A_{ij} + \beta_{5j}age_{ij} + \beta_{6j}income_{ij} \quad (1)$$

社区层级:

$$\beta_{0j} = \beta_1P_j + \beta_2S_j + \beta_3E_j + \beta_4A_j \quad (2)$$

式(1)和(2)中: i 为第 i 个个体; j 为第 j 个社区; ij 为第 j 个社区中的第 i 个个体。

研究模型以社会维度的社区健康为因变量,使用的具体量表如表2所示,采用12个变量的加权平均分;以基于主观评价的社区四维度属性为自变量。① 物质空间属性(P)。主要测度包括:居民对社区的整体环境品质、公共服务设施、便民网点、休闲活动空间、生态绿化及景观的感知与满意度评价。② 社会属性(S)。主要测度包括:居民对社区邻里关系的感知评价、居民间互帮互助的频率、居民间各种交往活动及分享互动的频率、居民参加各种社区活动的频率等。③ 经济属性(E)。主要测度包括:居民对社区的总体经济、日常便民服务经济、娱乐消费经济、文体教育服务经济等感知与评价,居民的日常购物消费占比,社区经济合作、社区就业等情况。④ 治理属性(A)。主要测度包括:居民对社区的总体管理水平、各项民生问题的解决、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公共资源的管理与维护、各项活动组织的评价。各测度题项均采用五级量表进行程度评价,分别对应5、4、3、2、1的分值。

为了确保各测度量表的可靠性,笔者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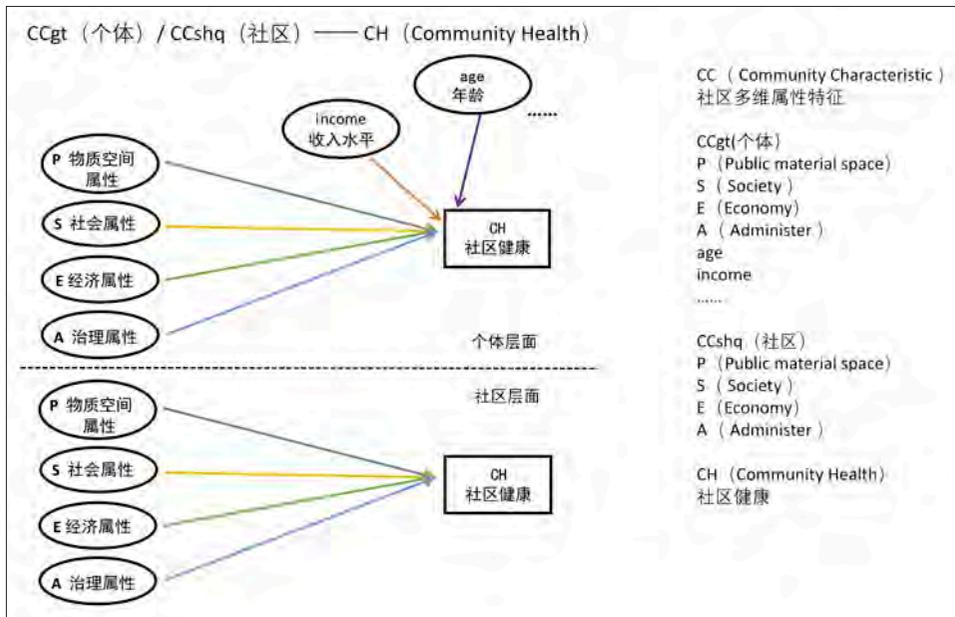


图3 社区四维度属性对社区健康的影响——多层线性模型示意图
Fig.3 The influence of communities' four-dimensional attributes on community health: schematic diagram of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2 社会维度的社区健康测量表(CH)
Tab.2 Measurement scale of community health

指标编码	社区健康	指标级数	测度题项
CH1	认同	5	1.您是否认为自己属于这个社区?
CH2	归属	5	2.在此社区居住,是否让您有家园一样的感觉?
CH3	依恋	5	3.您是否舍不得搬离此社区?
CH4	社群联结	5	4.和邻里间的友谊对您来说是否重要?
CH5	信任感	5	5.您对大部分的邻居是否有信任感?
CH6	安全感	5	6.在社区范围内的生活与活动,您是否感觉安全和放松?
CH7	自豪感	5	7.您是否为自己所在的社区感到自豪?
CH8	信心	5	8.您是否对社区的将来充满信心?
CH9	共同价值观	5	9.您认为您和邻居们是否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对该社区的发展有共同的愿景和需求?
CH10	共同行动	5	10.您是否愿意和邻居们一起努力,解决社区的各种问题,改善社区的品质?
CH11	行动规范	5	11.您是否在意邻居对自己行为的看法?
CH12	行动影响	5	12.如果在街区发现有可疑的人或事情,您是否会提醒邻居注意?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合调研数据进行量表的信度、效度检验。结果表明各量表的信度、效度良好,克伦巴赫 α 信度在0.762—0.877之间,效度检验的模型拟合指标亦在合理的范围内,可用于各种建模分析。此外,为了检验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是否严重,采用Harman单因素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最终发现析出42个因子,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了32.387%的方差,小于50%,说明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量表可用于建立各种模型。

2.2 结果分析与机制探讨

2.2.1 模型建构与分析结果

(1) 解释变量的选取

参考相关研究的变量选取方法^[35],首先在第一层(个体层面),以每位居民对其物质空间、社会、经济、治理属性的主观评价为解释变量(个体样本数3 302),同时加入居民年龄、收入两个个体特征变量;变量的选择既强调个体的情感和感知,又关注个体的基本人口特征。

其次在第二层(社区层面),以每个社区

中所有居民样本对其社区物质空间、社会、经济、治理属性的主观评价作为解释变量（即采用相应社区所有个体样本主观评价的均值来“刻画”各社区的属性特征，社区样本数15个），亦可理解为，居民对某社区各维度属性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该社区的属性特征。

在此变量选择中，虽然第一层和第二层的一些解释变量是“相同”的，但其影响在理论上是不同的。第一层是用个体数据去预测个体的因变量在所在社区的相对水平，第二层是用社区层面的数据去预测某个社区层面变量的水平。也就是说，即便是相同表述的自变量，其个体层面的效应和社区层面的效应也存在不同。个体层面的效应是由个体的归因取向所导致的，而社区层面的效应是整体水平的结构化、综合性影响所导致的（如社区整体的居住满意度，当一个社区内居民的居住满意度都比较高时，居民之间就会口耳相传，存在相互影响）。此外，由于社区层面样本数量不多，解释变量不宜添加太多，研究深度和详尽程度受到一定限制，但意在初步探究其框架性的基本规律。

(2) 零模型

在构建完整模型之前，先建构没有解释变量的零模型，即方差成分分析。通过零模型可以确定对社区健康的影响中有多大比例是由于第一层（个体）、第二层（社区）的差异造成的。结果表明，组内和组间方差均显著不为0，ICC为0.062，大于0.05，说明数据适合建立多层模型^[36]，对社区健康的影响中有93.8%来自第一层（个体）层面，有6.2%来自第二层（社区）层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对社区健康的影响中，各维度环境通过个体感知产生系列影响的路径。这也印证了社区的人文主义内涵。

(3) 模型结果

研究采用Mplus8.0软件，建立多层线性模型，探究个体层面和社区层面的各变量对社区健康的影响。模型拟合良好（CFI=1.000，TLI=1.000，组内SRMR=0.000，组间SRMR=0.001，RMSEA=0.000），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结果表明：物质空间属性、治理属性在个体层面对社区健康水平存在显著影响；经济属性在社

区层面对社区健康水平存在显著影响；社会属性在个体层面、社区层面均存在显著影响；年龄在个体层面对社区健康水平存在显著影响；家庭年收入与社区健康的相关性并不显著。此外，社区健康水平在社区间残差为0.132，被解释了89%，个体间残差为14.390，被解释了47%，说明解释变量对社区健康水平的解释程度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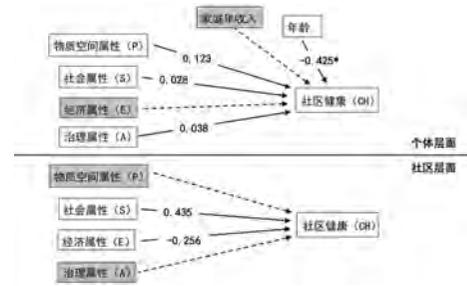
2.2.2 社区健康影响机制探讨

基于上述零模型和多层线性模型结果的分析，发现社区健康的影响机制存在显著的层级差异及多重作用路径（见图4），总结如下。

(1) 社区健康的“个体化”作用路径显著，印证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社区系统中的重要意义，同时“结构化”的作用特征也不可忽视，整体呈现个体与社区之间动态互构的作用关系。对社区健康的影响有93.8%来自第一层（个体），反映了“个体化”的作用路径，即通过个体对各维度环境的感知而对社区健康产生重要影响，体现了人本的需求、感知与情感等在社区运作中所起的十分关键的作用。同时，来自社区层面的差异也不可忽视，对社区健康仍有6.2%的影响，体现了“结构化”的作用特征。从“人文”与“结构”相结合的“人—物”动态互构理论来看，社区层面的特征与“人”之间不断地动态互构，引发各种情感与行动机制，同时塑造相应的社区特征，共同作用于社区健康及社区系统中。

(2) 社区的各维度属性对社区健康的影响呈现了差异化的作用路径特征。其中，物质空间属性、治理属性更多地体现“个体化”的作用路径，即更多地通过个体主观能动性的评价和感知而直接作用于社区健康水平；而社会属性、经济属性则更多地通过社区层面“结构化”的作用路径，即其特征融合于社区属性的结构中，进而对社区健康产生影响。

① 物质空间属性在社区层面对社区健康影响不显著，而在个体层面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反映了社区的物质空间品质通过居民个体的感知而对社区健康产生更加直接的作用。该属性呈现了“个体化”的作用路径，主要体现了个体主观能动性的作用逻辑。这也意味着，居民在社区的日常生活中，对各物质空间的广泛使用与感知均无时无刻直接影响着社区健康



注：* 个体年龄对社区健康的影响显著，其中30—59岁系数为-0.425，≤29岁系数为0.093。

图4 基于多层线性模型结果的社区健康的影响机制 Fig.4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ommunity health based on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3 社区健康的影响因素及其显著程度（基于多层线性模型的结果）

Tab.3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unity health and their probability value (based on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因变量社区健康(CH)	解释变量	系数(标准化估计值)	显著性(p)	
个体层面 (第一层)	物质空间属性(P)	0.123***	0.000	
	社会属性(S)	0.028***	0.000	
	经济属性(E)	0.009	0.143	
	治理属性(A)	0.038***	0.000	
	年龄	≤29岁	-0.093**	0.002
	(参照: ≥60岁)	30—59岁	-0.425***	0.000
	家庭年收入	40万—80万元	0.023	0.444
(参照: <40万元)	>80万元	-0.012	0.823	
社区层面 (第二层)	物质空间属性(P)	-0.795	0.283	
	社会属性(S)	0.435***	0.000	
	经济属性(E)	-0.256*	0.004	
	治理属性(A)	0.964	0.094	

注：①年龄、家庭年收入为虚拟变量，设参照标准；② * P<0.05, ** P<0.01, *** P<0.001。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康。因此,社区物质空间品质的优化需更多关注居民个体的使用需求和感受,为其提供更优质便利的使用体验。

② 社会属性在社区层面和个体层面对社区健康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在社区层面具有更强的效应力,反映该属性呈现了更多“结构化”的作用路径。社会属性在个体层面对社区健康水平呈现较为微弱的作用力,路径系数为0.027;而在社区层面,路径系数为0.435。可以理解为,社区关系认同、交往互动等变量因素,一方面通过居民个体的感知与认同而对社区健康水平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这些关系认同和交往所形成的整体化“社群效应”、关系网络等,对社区健康产生更显著的影响。由此,对社会属性的优化,需考虑居民个体对社区互动网络的直接感知,同时更应注重其“结构化”的整体效应。

③ 经济属性在社区层面对社区健康存在一定的负向影响,但在个体层面的影响不显著,反映该属性呈现了更多“结构化”的作用路径。可以理解为,各种经济业态、活力等特征所形成的整体性效应,对社区健康产生相应的作用。模型呈现一定的负相关,结合相关调研信息可理解为:现阶段社区多为基本服务经济,对空间环境具有一定的干扰性。城中村基于其特殊的人口消费需求、租金、业态结构等,主客观的经济属性指标均较其他类型更高,但由此也造成较多的环境卫生管理难题,使得居民对环境品质的认同趋弱。如广州市白云区黄边城中村之前有大量的食肆分布于村内和周边,对社区环境产生较大的干扰,村委(经济联社)自发开展了对该业态的清理和整治,优化了社区环境,产生了更好的租金效应,同时也提升了居民对环境的认同度。由此可见,某一阶段经济属性可能会对物质空间品质产生一定的负向关联,进而对社区健康产生负向影响。因此,对经济属性的优化需更多考虑其“结构化”的作用特征,并平衡与其他属性的负向关联,进一步促成其与社区、居民的正向效益关联。

④ 治理属性在社区层面对社区健康的影

响并不显著,而在个体层面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反映该属性呈现了更多“个体化”的作用路径,即更多通过居民个体的直接感知评价而对社区健康产生作用。如此,社区治理的优化需更多地从居民需求与服务认同的视角开展,进而优化社区治理的模式与效应。

3 结语与讨论

人居健康关乎广大民众的基本福祉,社区蕴含广泛的基层活力,更是深耕人居健康的沃土。基于“人文”“结构”的交叉理论分析视角,现代城市社区具有丰富的“人本”内涵。同时,社区也承载了多元的功能,具有物质空间、社会、经济、治理四维度属性。社区健康涵盖了社区尺度中个体健康与社会环境的健康以及两者的良性互动内涵,更强调因居住集聚而形成的内在关联与健康效应。

据此,本文建构系统的研究框架,运用多层次线性模型,分析社区物质空间、社会、经济、治理4个维度属性对社区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社区健康的影响机制中“个体化”作用路径显著,体现了深刻的人文主义内涵,居民的个体主观能动性在社区系统的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社区4个维度属性对社区健康的影响,呈现了差异化的作用特征,在实际的社区建设与治理中应采取相应的差异化路径和措施。其中物质空间属性、治理属性主要在个体层面对社区健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社会属性、经济属性则更多体现了社区层面的“结构化”的作用路径。

基于模型及相关的综合分析,提出以下策略建议以提升社区健康水平:① 在物质空间的营建中,以人们的使用需求与感知特征为依据,营造精细化、人性化的物质空间环境。② 注重社会网络的“结构化”效应,运用多元的手段培育良好的社群关系与社区认同。如通过物质空间的共享,注入更多社区交往、信息共享、社区参与的契机,培育各种社群联结,推动“结构化”的共享效应,以此提升社区健康水平。③ 融合现代城市生活特征,深化整合社区经济与服务,形成更具活力、永续性的业态结构,注重经济业态与环境的良性关系。从基本服务消费

转向更多的品质消费与体验消费,在社区中培育多元创新型业态,如家政一体化、文化艺术、老年康养、青年时尚体验等,并在转型升级中促使经济与环境良性共生。④ 注重从居民的需求和满意度的视角,建立相关治理指标评价体系。优化治理对策,推动多元协同、人性化、智慧化的治理内涵转型创新。⑤ 注重物质空间、社会、治理、经济属性之间的关联效应,共同促进社区健康。如通过社区治理政策的推行来解决空间品质的盲点与难题;通过社群联结、居民行动来管理、维护良好的环境品质;通过合理的经济业态来激活可能的空间品质优化能量等。

本文旨在较系统地剖析社区各维度属性对社区健康的影响,从而对人居健康在微观层面的研究有所补益,并为社区的健康发展提供基础研究依据。相关内容仍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拓展和深化。■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HE S, LIN G. Producing and consuming China's new urban space: state, market and society[J]. *Urban Studies*, 2015, 52(15): 2757-2773.
- [2] WEI E, WANG B, CHEN T, et 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urban Guangzhou since 1980: a social sustainability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Spatial Plann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6, 4(4): 58-68.
- [3] 赵雪雁,王伟军,万文玉. 中国居民健康水平的区域差异:2003-2013[J]. *地理学报*, 2017, 72(4): 685-698. ZHAO Xueyan, WANG Weijun, WAN Wenyu. Regional inequalities of residents' health level in China: 2003-2013[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4): 685-698.
- [4] WHO. Preventing disease through healthy environments: towards an estimate of the environmental burden of disease[M].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6.
- [5] 谢劲,全明辉,谢恩礼. 健康中国背景下健康导向型人居环境规划研究——以杭州市为例[J]. *城市规划*, 2020, 44(9): 48-54. XIE Jin, QUAN Minghui, XIE Enli. Research on health-oriented human settlements planning in the context of Healthy China: a case study of Hangzhou[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0, 44(9): 48-54.
- [6] KWAN M. Geographies of health[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12, 102(5): 891-892.
- [7] GILES-CORTI B, VERNEZ-MOUDON A, REIS R,

- et al. City planning and population health: a global challenge[J]. *Lancet*, 2016, 388: 2912-2924.
- [8] STEPTOE A, FELDMAN P J. Neighborhood problems as sources of chronic stress: development of a measure of neighborhood problems, and associations with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health[J]. *Annals of Behavioral Medicine*, 2001, 23(3): 177-185.
- [9] GUILTE H F, CLARK C, ACKRILL G. The impact of the physical and urban environment on mental well-being[J]. *Public Health*, 2006, 23(3): 1117-1126.
- [10] ELLIOTT M. The stress process in neighborhood context[J]. *Health & Place*, 2000, 6(4): 287-299.
- [11] 朱站, 李如铁, 苏斌原. 微观视角下的移民地方感及其影响因素: 以广州市城中村移民为例[J]. *地理学报*, 2016, 71 (4): 637-648.
- ZHU Hong, LI Rutie, SU Binyuan. The migrants' sense of pla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n a microcosmic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the migrants in the urban villages in Guangzhou[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4): 637-648.
- [12] LIU Y, DIJST M, FABER J, et al. Healthy urban living: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and health of older adults in Shanghai[J]. *Health & Place*, 2017, 47: 80-89.
- [13] 孙斌栋, 阎宏, 张婷麟. 社区建成环境对健康的影响: 基于居民个体超重的实证研究[J]. *地理学报*, 2016, 71 (10): 1721-1730.
- SUN Bindong, YAN Hong, ZHANG Tinglin. Impact of community built environment on residents' health: a case study on individual overweight[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10): 1721-1730.
- [14] LIU H, LI F, LI J, et al.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urban parks, residents' physical activity, and mental health benefits: a case study from Beijing, China[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7, 190: 223-230.
- [15] WEN M, FAN J, JIN L, et al. Neighborhood effects on health among migrants and natives in Shanghai, China[J]. *Health & Place*, 2010, 16(3): 452-460.
- [16] 周素红, 何嘉明. 郊区化背景下居民健身活动时空约束对心理健康影响: 以广州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 (10): 1229-1238.
- ZHOU Suhong, HE Jiaming. Effects of spatial-temporal constraints of suburban residents on fitness activities to mental health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sub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in Guangzhou, China[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7, 36(10): 1229-1238.
- [17] DONG H, QIN B. Exploring the link between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and mental wellbeing: a case study in Beijing, China[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7, 164: 71-80.
- [18] 吴蓉, 潘卓林, 刘晔, 等. 城市街景绿地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广州为例[J]. *地理研究*, 2021, 40 (8): 2272-2291.
- WU Rong, PAN Zhuolin, LIU Ye, et al. The effect of streetscape greenery on residents' mental health: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1, 40(8): 2272-2291.
- [19] 袁媛, 陈玉洁, 刘晔, 等. 广州社区绿化环境对居民自评健康的邻里影响[J]. *地理学报*, 2021, 76 (8): 1965-1975.
- YUAN Yuan, CHEN Yujie, LIU Ye, et al. The neighborhood effect of residential greenery on residents' self-rated health: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76(8): 1965-1975.
- [20] 程晗蓓, 李志刚. 邻里变迁影响城市居民健康的国际研究进展与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22, 37 (5): 98-106.
- CHENG Hanbei, LI Zhigang.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on the impacts of neighborhood changes upon residents' health[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22, 37(5): 98-106.
- [21] 顾丽娟, ROSENBERG M, 曾菊新. 社会经济及环境因子对不同收入群体自评健康的影响[J]. *地理研究*, 2017, 36 (7): 1257-1270.
- GU Lijuan, ROSENBERG M, ZENG Juxin. The impacts of socio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self-rated health status among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in China[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7): 1257-1270.
- [22] 杨婕, 陶印华, 柴彦威. 邻里建成环境与社区整合对居民身心健康的影响——交通性体力活动的调节效应[J]. *城市发展研究*, 2019, 26 (9): 17-25.
- YANG Jie, TAO Yinhua, CHAI Yanwei. Neighborhood built environment, community cohesion and public health: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ransport-related physical activity[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9, 26(9): 17-25.
- [23] 邱雯芝, 陈宏胜, 李志刚, 等. 基于邻里效应视角的城市居民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市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 (2): 283-295.
- QIU Yingzhi, CHEN Hongsheng, LI Zhigang, et al. Exploring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al effects on mental health: a case study in Guangzhou, China[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9, 38(2): 283-295.
- [24] 张舒怡, 林赛南, 李志刚, 等. 邻里环境感知对中国城市居民自评健康影响研究——以武汉市为例[J]. *人文地理*, 2019, 34 (2): 32-40.
- ZHANG Shuyi, LIN Sainan, LI Zhigang, et al. Influence of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on self-rated health of residents in cities of China: a case study of Wuhan[J]. *Human Geography*, 2019, 34(2): 32-40.
- [25] 孙文尧, 王兰, 赵钢, 等. 健康社区规划理念与实践初探——以成都市中和旧城更新规划为例[J]. *上海城市规划*, 2017 (3): 44-49.
- SUN Wenyao, WANG Lan, ZHAO Gang, et al. Concept and practice innovation of healthy community planning: a case study of urban regeneration of Zhonghe Old Town in Chengdu[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7(3): 44-49.
- [26] 谢波, 王潇, 伍蕾. 基于自然实验的城市绿色空间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以武汉东湖绿道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 (7): 1141-1153.
- XIE Bo, WANG Xiao, WU Lei.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urban green space on residents' mental health using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aking Wuhan East Lake Greenway as an example[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1, 40(7): 1141-1153.
- [27] WEBSTER C. The nature of neighborhood[J]. *Urban Studies*, 2003, 40(13): 2591-2612.
- [28] 叶原源, 刘玉亭. 城市社区的邻里性本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以广州15个社区为例[J]. *地理研究*, 2022, 41 (7): 1963-1980.
- YE Yuanyuan, LIU Yuting. Research on the neighboring and its influence mechanisms: a case study of 15 communities in Guangzhou[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2, 41(7): 1963-1980.
- [29] 叶原源, 刘玉亭. “移动社区金融”与现代城市邻里的激活路径思考[J]. *城市发展研究*, 2017, 24 (6): 81-89.
- YE Yuanyuan, LIU Yuting. The "mobile banking for community" and activation paths for neighborhood in modern cities[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7, 24(6): 81-89.
- [30] TUAN Y-F. Geography, phenomenology, and the study of human nature[J]. *Canadian Geographer*, 1971, 15(3): 181-192.
- [31] 于涛方. 结构主义地理学——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J]. *人文地理*, 2000(1): 66-69.
- YU Taofang. Structuralism Geography: an important school in western human geography[J]. *Human Geography*, 2000(1): 66-69.
- [32] 周尚意, 杨鸿雁, 孔翔. 地方性形成机制的结构主义与人文主义分析——以798和M50两个艺术区在城市地方性塑造中的作用为例[J]. *地理研究*, 2011, 30 (9): 1566-1576.
- ZHOU Shangyi, YANG Hongyan, KONG Xiang. The structuralist and humanistic mechanism of placeness: a case study of 798 and M50 art districts[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9): 1566-1576.
- [33] 乔纳森·默多克, 李祎. 后结构主义和关联的空间[J]. *国际城市规划*, 2010, 25 (5): 8-18.
- MURDOCH J, LI Wei. Post-structuralism and relational space[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0, 25(5): 8-18.
- [34] STEENBURGEN M R, BRADFORD S J. Modeling multilevel data structures[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2, 46(1): 218-237.
- [35] 何深静, 左姣姣, 朱寿佳, 等. 中国大城市贫困研究的多种测度与多层模型分析[J]. *人文地理*, 2014, 29 (6): 74-80, 87.
- HE Shenjing, ZUO Jiaojiao, ZHU Shoujia, et al. Understanding urban poverty in large Chinese cities using multiple measurements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models[J]. *Human Geography*, 2014, 29(6): 74-80, 87.
- [36] 温福星. 多层次研究中组织变量聚合的探究[C]//第十二届全国心理学学术大会论文摘要集. 北京: 中国心理学会, 2009: 389.
- WEN Fuxing. The aggregation of organizational variables in multi-level research[C]//Collection of abstracts of the 12th National Psychology Academic Congress. Beijing: Chi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9: 389.